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八

施公案和彭公案

萧宿荣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八辑
施公案和彭公案
萧宿荣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7212 印刷厂 印刷

字数：8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3}{4}$
印数：1—10,646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杨 浩

ISBN 7-5382-1672-6/I·80

定价：2.50 元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编委会

顾问 林 辰 章培恒

主编 侯忠义 安平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王 申 王海明

安平秋 张 俊 沈国经

欧阳健 骆桂明 侯忠义

曹亦冰 萧相恺 董哲潜

内容简介

世道不公，人们幻想清官；世事不平，人们钦慕侠客，于是侠义、公案小说久盛不衰。从《施公案》和《彭公案》起，清官与侠客合作，于是侠义、公案小说以新的姿态走进了小说史的新阶段。本书对《施公案》与《彭公案》从内容到形式，皆作了历史的、辩证的介绍和评述；从美学批评的角度指出其艺术特征，从而揭示了延续千年的“清官梦”和“侠客梦”的深层文化现象。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

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 一、《施公案》与《彭公案》的诞生 1
- (一) “康熙之治”与《施公案》、
《彭公案》所反映的时代历史 1
- (二) 中、晚清的社会特点与
“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 4
- (三) 关于《施公案》、《彭公案》
的版本 10
- 二、话说《施公案》、《彭公案》中的
“公案” 14
- (一) 《施公案》、《彭公案》的
故事梗概 14
- (二) “公案”知多少 15
- 三、“梦清官”与“清官梦” 44
- (一) “清官梦”产生、延续的社会
心理基础与“清官”形象的流变 44

(二) 历史上的施公、彭公与小说中的施公、彭公	48
(三) 试圆“清官梦”——谈谈小说中的施公、彭公	53
四、“侠客梦”及其幻灭	64
(一) “侠客梦”与“侠意识”	64
(二) 从“义侠”“盗侠”到“忠侠”“官侠”——“侠客梦”的幻灭	70
(三) 说说“清官”与“侠客”的联袂	83
(四) “官侠”的榜样——金镖黄天霸和忠义侠马玉龙	88
五、对《施公案》、《彭公案》的美学批评	
(一) 勾连串套，结构独特	106
(二) 人物众多，形象模糊	114
(三) 字句拙劣，语言粗糙	124
六、应该给《施公案》《彭公案》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代结语	133

一、《施公案》与《彭公案》 的诞生_____

（一）“康熙之治”与《施公案》、《彭公案》 所反映的时代历史

清代嘉庆（1796—1821）初年，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崭新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创作模式诞生了，这就是以《施公案》为标志的“侠义”、“公案”合二为一的小说。《施公案》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一续再续，一仿再仿。受其直接影响，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彭公案》付梓。两部小说写作的时间虽相距约一个世纪，但它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却是一致的——即都以清康熙朝（1662—1723）为虚托，且两书的构思相仿，两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多有交叉和衔接之处，前呼后应的侠客就有黄天霸、李七侯、窦尔墩、朱光祖、计全等二十来个。两书所表现的内容也大体相仿，即一位大清官率领众“官侠”屡破疑案、大案，为国除害，为民伸冤。《彭公案》虽书出于《施公案》之后，但其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却在《施公

案》之前，故两书堪称“姊妹篇”。

《彭公案》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河清海晏，五谷丰登，万民欢乐，国泰民安。”九十五回又云：“当今圣上聪若尧舜，德配天地，四夷来朝，八方宁静，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固有溢美之处，但清圣祖康熙皇帝却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聪明能干、励精图治的皇帝之一。满族入关的最初几十年，满族贵族重新掠夺土地，推行皇庄、王庄制，在经济上有局部的倒退。到了康熙手上，统一了台湾，削平了三藩，全国空前统一强大起来。在经济方面，他控制了历代增丁加税制（《清朝通典》：“滋生人丁，永不加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是有利的。他十分重视河务，屡请专家为黄患、淮泛、漕运改进堤疏，并六次南巡，勘察水利，致使全国垦田率迭年递增。康熙朝的工商业也很发达，苏州每年造优质铁力木船就达六千艘。又增设通商口岸，促进丝织、棉纺、陶瓷、冶炼业的发展。在内政方面，康熙帝实行“满汉复职制”，重用汉人。他三次亲自率领军队转战大漠，平复分裂主义者葛尔丹的叛乱。派遣图理琛前往伏尔加河下游，去看望受沙皇“役属”而“恒归向中国”的土尔扈特部落同胞（至乾隆时突破沙皇军队的重围，返回祖国）。他专为西藏确定班禅额尔德尼封号，派皇太子允禔等经青海入藏平叛，送回达赖六世。康

熙为统一版图辽阔的多民族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外务方面，他力主武功，不屈外侮，建立了爱琿、齐齐哈尔等城堡，派彭春引水师攻克沙俄匪徒所盘踞的雅克萨城，在斗争中与沙皇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迫使他们承认了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是中国的土地，捍卫了中华民族领土的完整。在文化方面，康熙带头学习经史，从各省选拔文品兼优的汉人入翰林院侍读；组织大批汉人修明史、编纂类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使文艺大兴。康熙一代，延至雍正、乾隆、嘉庆朝，堪称“盛世之治”，中国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进步。虽然他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如大兴“文字狱”等），但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是向前迈进、走向兴盛的。^①

固然，康熙帝领导大清王朝逐步走向鼎盛强大，然而，他的统治也毕竟根基方稳，那些根生于人民之中的绿林好汉、剑侠豪客，对其统治来说似厝火积薪。虽是疥癬之疾，到底也关痛痒。因此，统治者一方面靠武力平定，一方面靠招诱安抚。这种新的政治形势，强烈要求统治者举“清官”，抚“绿林”，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施公案》、《彭公案》二书虽不作于康熙朝，

^① 参见宝文堂书店1982年版《施公案》附录，谢振东等《论〈施公案〉》。

但却能以康熙朝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故事情节展开的时空，而不给人以大而无当的感觉。

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与现实的生活必定是息息相关的。《施公案》、《彭公案》所反映的虽然是历史的题材、康熙朝的故事，但两书的创作时间大概起于十八世纪末叶的嘉庆初年而迄于二十世纪伊始的晚清。为什么《施公案》、《彭公案》会诞生于这个时期且均被一续再续、经久不衰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题。

（二）中、晚清的社会特点与“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

十八世纪的清中叶是相对平和稳定的时期，“康乾盛世”使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发展了，生活比较稳定了。同时，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又使满族贵族勾结汉族地主重新瓜分土地，于是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同恶相济，日益鱼肉百姓，社会风气又渐渐开始腐化堕落了。所以，人们盼望“清官”复出、“侠士”再现，为民除害，清扫恶孽，成为非常迫切而现实的情势。进入19世纪，清王朝已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封建政权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弊端日渐显露，国力每下愈况，各地反抗政府的斗争时起时伏，或零星自发，或有组织有规模，社会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面前，单靠清官安抚，或单凭武力镇压，都很难奏效。清廷

乃实行“剿抚并重”的政策，使“清官”和“武侠”的结合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和必要。这应该说是“公案”、“侠义”小说在十八世纪末期合流、在十九世纪末大量涌现的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小说史家胡士莹先生对此有这么一段分析：“一方面，市民和农民对土豪恶霸、盗贼罪犯、贪官污吏的愤恨十分强烈，而对封建制度却缺乏本质的认识，因而《施公案》等书的清官理案、‘除暴安良’的假象，也很容易迷惑市民。另一方面，主要的一面，清代中叶以后，在以清王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方面，这种公案侠义小说更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反动阶级愿望，他们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中虽然还暂时是胜利者，但也已感到岌岌可危，急需为反动阵营招兵买马，而他们利用舆论的伎俩也更熟练了。因而，他们不但像明代的公案小说那样，用清官来麻痹人民，使其放弃斗争，被动地等待解救；他们更用‘侠义’来腐蚀人民，妄图使其变节投降，主动地为皇帝当打手。充分反映了清代中期以后，清王朝在人民的武装斗争面前的恐惧和仇恨。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侠义’、‘清官’所起的蛊惑作用是大喜过望的。于是就竭力扶持奖励，利用他们来扩大宣传，宣传忠君思想、奴才思想和变节投降的行为，把它们尽力地

美化。”^①这样的社会学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不精辟。再则，晚清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凌与侮辱，受打挨揍，历尽苦难，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反思于这种积弱积贫的现状，既渴望有清廉贤能的官吏来整饬社会，更期望能以弘扬急公好义、慷慨赴死的侠义武士精神来振奋人心、振兴国家。应该说，这也是清官侠义小说在晚清隆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先生在论述《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时道：“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在明亡已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羨。”^②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亦云：“这些书（指《施》、《彭》之类）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军，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这是从社会心理因素的角度来解剖公案、侠义小说合流并广为传播的原因。晚清溶合形形色色的下层市民、各种有钱的上层市民和“城市地主”而成的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也杂糅了各种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672—673页。

^② 见《中国小说史略》。

各样的思想成分，其总的心态是：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盗贼犯罪十分痛恨，却又不愿铤而走险，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士身上；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唯恐社会动乱打破现状，于是又切盼清官、侠士来维持社会的平衡；他们有着朦胧的自由要求，却又不肯贸然一试，而寄厚望于以“自由”实现自己意愿的神出鬼没的侠士。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民最底层人民意愿的英雄侠士和在根本意义上体现了市民上层社会理想的清官，便奇妙地结合在长篇章回小说里，以集合的方式反映了中晚清社会带有普遍性的市俗愿望。无疑，这种清官、侠士合而为一的小说模式是人民群众颇愿传颂而又令上层统治者乐于接受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文学样式只要有了读者，便有了生命力，有了发展、发达的基础和条件。

以上是从文学形式发展的外部条件来谈公案侠义小说合二为一的时代背景。再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来看，清代中叶以前，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流派各自独立地发展着。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特点，使人们对文学作品产生了一种新的期待，即让那些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同为处于困境而又无勇气反抗的市井细民心中的“救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与公案小说中的“清官”相辅

相成，携手奋斗，使侠客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使清官的能量因侠客的神勇绝技而大大增强，形成一种颇为理想的格局。当时畅行着的专讲柔情的《红楼梦》无法满足这一期待，专讲妖怪的《西游记》也无法满足这一期待，即便市民嗜读的《三国》、《水浒》同样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武侠小说、公案小说中主角形象的接近与互补，使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的合流有了可能。被鲁迅先生称为“侠义小说先导”的《施公案》应时而降，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正好投合了大众对小说艺术新的期待视野，所以流行特别快、特别盛，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另外，《施公案》是一部由口头说唱文学经过记录、整理、加工而成的小说文本，清代市民社会的繁盛，使“评话”艺术特别发达，民间坊刻遍布全国。小说艺术的商业性很强，大部分的武侠、公案小说都是说话艺人的创作或文人为满足“评话”演出的需要而创作的。显然，这些都是影响小说艺术转变的重要因素。从社会文化心理来看，清代中叶，人们的审美理想包括文艺欣赏习惯已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满足只“奇”不“险”的公案小说或有惊有险但缺乏悬念、奇闻的武侠小说。人们的视听开始转向那些篇幅浩繁、矛盾更加尖锐、情节更富惊险、思想感情更与己贴近，且更富感官刺激的评书、小说。文化市场的这种迫切要求，迫使艺人、书贾和文人合作，对

原有的单一题材的作品加以调整、充实、改造、合流、提高。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即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需要所作的具体的自我调节。

诞生于中、晚清的《施公案》、《彭公案》为什么要以康熙朝为假托呢？法国的剑侠小说作家大仲马在《侠隐记》前面有喻：谁揭露本国时弊，除了逃到外国去写作外，再就是假托前代，不然就得去蹲巴士底狱。莎士比亚就是假“丹麦是个大牢狱”来抨击包括英吉利在内的欧洲黑暗时期的。我们知道，为加强思想控制，清代文字狱风行，担心以文贾祸的文人学者，或钻入故纸堆里埋头考据学而有功绩卓著的“乾嘉学派”，或假古讽今、似《儒林》暗托朱明、明骂清朝，或联合艺人、书贾写一些既能使“圣心大悦”、至少不会触犯“龙颜”、不被限制，且又能迎合小市民口味的作品，武侠公案小说正遵循了这一原则。再则，康熙帝崇高的声望与盖世的功勋，使身处衰世的人们心神向往之至，祈盼能有一个“康熙”再世，以赶走贫困和衰弱，让国家再度强大起来，这是康熙帝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感召力使作家十分自然地想到要假其威力，且《施公案》、《彭公案》常触动皇权勋戚，请圣祖出面开口来杀伐决断无疑更具有震慑力。故作家假借强盛的康熙朝为大背景，以映衬当时的现实，力求起到惊醒世人、振兴世风的作用。